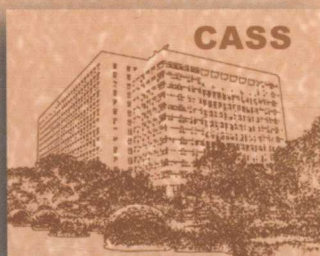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从翰香集

从翰香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从翰香集

从翰香/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翰香集/从翰香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3743-9

I. ①从… II. ①从… III. ①农业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S-09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8256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从翰香集

著 者 / 从翰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魏小微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宋淑洁 岳 蕾

责任校对 / 师敏革

责任印制 / 岳一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743-9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22

字 数 / 469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	1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	23
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	78
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04
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发展的考察	120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清末民初华北平原冀鲁豫三省的农村	141
孙中山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改革	164
明代棉业史	179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资本对内地市场的占领	300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

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国内外史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和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历史学特别重视这个问题相联系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在宣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所谓“人民性”的同时，还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描绘成“和平的”、“演进的”过程。说什么资产阶级乃是“勤劳节俭”起家的，借以欺骗和麻痹人民。因此，研究资本的原始积累，揭露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即使在现在，也依然是必要的。

同时，大家之所以十分注意这个问题，还因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本身，尚有许多疑问等待回答。

马克思对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精辟分析和深刻揭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原始积累的生动画面。马克思又告诉我们说：“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①这就是说，要对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作具体的研究。

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仅就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作一些初步探索。

什么是资本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其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要有大批无产者可供资本家雇佣；另一方面要积累起建立资本主义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财富。这些条件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先行阶段，马克思将这个阶段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说，这个阶段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其相适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784页。

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①。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②。

同时，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形成，乃是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横遭剥夺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又说，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③。然而，马克思并不是说，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任何分离，都构成原始积累。就我国来说，远早于鸦片战争前，地主、官僚、商人与高利贷者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就已在不断地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了。他们握有巨额的财富，但是，除了用来满足奢侈的寄生生活以外，其余的，主要都投入了土地，其次则用来进行商业投机或高利盘剥。所以，财富的积累主要表现为土地集中。而那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从生产资料中游离了出来，却并没有成为资本统治之下的劳动力出卖者。绝大多数人都沦为贫农、佃农和雇农了。这些劳动者和土地的结合，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合，而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结合形式。

马克思早已明确地指出过：原始积累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④。由此可见，原始积累的基本内容，在于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否转化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垫支资本，如果没有完成这种转化，不管积累得如何之多，也不可能构成原始资本的来源。

但是，在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人却忽视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原始资本的各种来源，有的说地租转化占首要地位，其次便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等^⑤；有的说官僚资本的转化占首要地位，其次是买办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等^⑥；有的甚至说，中国货币资本的主要积累手段，只能是前资本主义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⑦。他们将地主的地租剥削、贵族的赏赐和分封、官僚的敲诈勒索、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盘剥，大书而特书，究竟这些积累是否转化为资本却不见交代，这显然是混淆了封建形式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区别。

我们认为，只有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积累的科学定义，并对中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1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⑤ 孔令仁：《试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⑥ 谷书堂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第92页。

⑦ 湖北大学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200页。

最早出现的一批资本主义企业作一番具体分析，看一看它们的资本来源究竟包括哪些成分，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估计各种来源的地位，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种种特色。

二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沿着一条很不正常的道路发展的。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①。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后，胁迫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便于他们进行掠夺的特权。他们不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括原料，而且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经营起近代工业、航运和公用事业。这批企业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化企业。

接着，从60年代起，清政府官僚集团创办军火工业，这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经营工业的开始。然而，就其生产关系的性质说，这批企业，不过是两千多年来封建官府工业的直接继承者，具有十足的封建性。

以上两类企业，一为外国资本，一为非资本主义企业。因此，它们的资金来源，都不属于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考察的范围。

继军事工业之后，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由官办军火工业转而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经营起采矿、炼铁和纺织等民用工业和轮船、电报等近代交通运输企业。诚然，这类企业仍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色彩，但从它们的主要经营目的和剥削性质——为市场生产商品并赚取利润，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看，却已基本上具备资本主义性质。因此，这类企业创办时的垫支资本的一部分，当属资本原始积累考察的对象。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创办、90年代以后才取得较大发展的、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才是原始积累问题的主要考察对象。

轮船招商局是招有商股的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先声，适可作为这类企业的典型。

该局是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创办的。招集股本的结果，得到商股银73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620页。

万两，又由沪津两海关拨官款 190 多万两，作为股本，官督商办。

必须指出，推动和支持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奏办轮船招商局的幕后势力，乃是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拥有巨资，并对新式企业跃跃欲试的买办。

这可以从李鸿章的《试办招商轮船折》^①前后时期致朋僚的函稿中得到证实。此折奏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而前此十个月，李鸿章在其致曾国藩的磋商创办轮船局的函稿中说：“租赁轮船一节，自是经久推广至计，津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议呈九条，照钞呈览。据称合凑本银三十万，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或请拨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已缄致上海广建各帮妥议。仲复履任后，就巨商反复筹计，或有定局，鸿章并嘱子敬随时函商仲复，无论何项委员经手，必须各关道就近商办。”^②同治十二年一月，李鸿章再一次提到“添招闽粤巨商入股”^③。

虽然李鸿章并没有明确指出这帮“闽粤巨商”都是买办，但这帮旅沪的闽粤巨商至少可以说多半是买办，这是可以由许多事实来证明的。当时人王韬说来沪“粤人……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④。再从招商局本身看，从 1872 年起，长期直接经理这家企业的不是别人，正是经历了多年买办活动的大买办唐廷枢（即唐景星）、徐润（即徐雨之）和郑观应。总办唐廷枢于 1863 年即为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会办徐润自 1852 年即已进入英商宝顺洋行，郑观应则长期经理宝顺、太古、公正等洋行的生意。而局中股本亦系这些人员经手招集。^⑤实际上，他们既是创办人，亦是股权握有者。轮船招商局设立前夕，唐廷枢即已“在港集股银十万元，租两船往来港沪”^⑥。正在此基础上，并通过盛宣怀的保荐，北洋大臣始委派唐廷枢总办轮船招商局。徐润亦首先附股（轮船招商局），前后计之共有 4800 股，合计银 48 万两。此外，徐润设法招徕各亲友入股，亦不下五六十万两。^⑦郑观应亦为股东^⑧，而唐廷枢、徐润以及后进入招商局的郑观应等人，恰恰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最早出现的一批广东籍买办。

轮船招商局的筹资历史表明，其名义上由官僚奏请创办，其实际筹划者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0，第 32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2，第 4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3，第 1 页。

④ 王韬：《瀛壖杂志》卷 1，第 9 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6，第 35 页。

⑥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 10，船务篇，第 35 页，《覆张君弼士书》。

⑦ 《徐愚斋自叙年谱》。

⑧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 10，船务篇，第 1 页，《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

和出资人，主要是来自买办。招商局恰恰是中国第一个招有商股的近代企业，这就表明，当中国开始创办近代企业时，首先投资的是买办。

关于中国民族工业的资本来源，我们选择以上海为主的若干地区（包括无锡、南通），自19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创办的一批较大规模的工业为典型，对其主要创办人出身及其资本关系加以考察。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段历史时期，主要考虑到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应以早期的垫支资本为研究对象，若将时间过于向后推移，势必会同资本主义积累（其来源是剩余价值）相混淆，至少是使这种混淆的可能性更加增大。同时，中国民族资本所创办的工矿企业，虽然自1873年起便已陆续设立，但70年代创办的毕竟为数甚少（仅20个左右），80年代虽略有增加，又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①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则几乎完全是1890年以后创办的。自189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为中国民族资本的最初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认为选择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作为考察范围，才是恰当的，有意义的。

再从地区上看，上海、南通、无锡，虽然只是区区三个地方，但它们在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史上却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仅以中国民族工业中进展最速、规模最大的部门——棉纺织业为例，1890~1913年的24年里，上海、南通、无锡这一小区域内的纱锭竟占全国纱锭数的44.8%以上。^②

自然，一般说来，创办人出身并不能完全说明原始资本的来源的性质。但中国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华资各厂大多数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有的虽名为公司，实则未尝公开大量招股，所以主要创办人多半就是主要投资人。因此对于主要创办人出身的考察，大体上可以反映原始资本各种来源的构成。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起见，下面按各行业，分别列表加以说明。^③

① 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科学出版社，1957，第44页。

② 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第107页第9表计算。

③ 资料来源：①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第38页，辛亥革命前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统计。②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47页，1936年前上海238家工厂主要创办人出身调查。③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第3章附录。④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以下诸表资料来源均同。

表 1 棉纺织业各厂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设立年度	工厂名称	主要创办人及其出身	资本额（元）	纱锭（枚）
1890	上海机器织布局	郑观应（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买办） 龚寿图（江苏候补道） 蔡鸿仪（郎中，业宏沪甬） 李培松（道员，盐商） 戴恒（翰林院编修）	699300	35000
1894	上海裕源纱厂	朱鸿度（上海道员）	——	25000
1895	上海裕晋纱厂	中国人与华俄道胜银行合办；此中国人可能是与道胜银行有关的买办	279700	15700
1895	上海大纯纱厂	盛某（上海富绅）	279700	20392
1896	无锡业勤纱厂	杨宗濂（长芦盐运史）等	335700	10192
1897	上海永泰纱厂	徐锦荣（出身不明）	279720	
1898	上海裕通纱厂	朱幼鸿（又名朱畴，朱鸿度之子，浙江候补道）	209800	18200
1899	南通大生纱厂	张謇（翰林院编修）	699000	23000
1905	无锡振新纺织厂	荣宗敬（钱庄主） 张石君（茂生洋行买办） 荣瑞馨（鸿源纱厂买办） 叶慎斋（怡和洋行买办） 鲍咸昌（布号股东） 徐子仪	419580	10192
1907	上海九成纱厂	中国人与日本梅花会社合办；此中国人可能是与日本有关的买办	461500	9424
1907	崇明大生纱厂	张謇	1210000	26000
1907	上海振华纱厂	吴祥林（怡和洋行买办）与怡和洋行大班凯福合办	419600	11592
1907	上海同昌纱厂	朱志尧（东方汇理银行买办）	600000	11592
1910	上海公益纱厂	祝大椿（怡和洋行买办） 席立功（汇丰银行买办）	1340000	25676

从 1890 年中国最早的一家大机器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始，至 1910 年止，上海、南通、无锡三地，民族资本创办的较大型的棉纺织厂共 14 家，其中一半是买办创办的或有买办参加投资。已知的 93 个投资人中，有 10 个是买办。14 家工厂中，资本最雄厚、纱锭最多的，除官僚张謇创办的大生纱

厂以外，其余几家都是买办创办的，如公益纱厂、同昌纱厂、振华纱厂、九成纱厂等。

表2 面粉工业各厂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设立年度	工厂名称	创办人及其出身	资本额（元）
1898	上海阜丰面粉厂	孙多森（尚书孙家鼐之子，候补同知）	350000
1900	上海华兴面粉厂	祝大椿（怡和洋行买办）	400000
1900	通州大兴面粉厂	张謇（翰林院编修）	20000
1903	无锡茂新面粉厂	荣宗敬、荣德生（钱庄主） 张石君（茂生洋行买办） 荣瑞馨（鸿源纱厂买办） 祝大椿	70000
1904	上海裕丰面粉厂	朱斗文（大亚银行常董）	140000
1904	上海裕顺面粉厂	朱计	140000
1905	上海中兴面粉公司	朱葆三（平和洋行买办）	350000
1907	上海立大面粉厂	顾馨一（粮店老板，买办商人） 王一事（大阪轮船公司、日清汽船公司买办）	280000 280000
1909	无锡九丰面粉厂	蔡絨三	280000
1910	上海申大面粉厂	王一亭、顾馨一、朱志尧（东方汇理买办）	280000
1912	上海大有面粉厂	顾馨一	56000
1913	上海福新一厂	荣宗敬（钱庄主）	150000
1913	无锡惠元面粉厂	孙复瑞 祝大椿	150000

统计材料表明，面粉业各厂投资人中，已知其出身者 11 人，买办 7 人，官僚 2 人，钱庄主银号股东 9 人，三个地区的 12 家面粉厂中，买办和买办商人创办或参加投资的达 7 家之多。

又据 1910 年所作调查^①，当时沪地面粉业中，增裕、阜丰、华兴三家规模最大。其中增裕为外资，华资两家大厂中，一为官僚孙多森（即尚书孙家鼐之子）创办的阜丰，一为买办祝大椿创设的华兴。就其创办资本说，华兴则超过阜丰，占第一位。

① 《东方杂志》1910 年第 9 期，第 86 页，调查篇《上海面粉公司谈》。

此外，关于立大、申大、大有三厂的资本家顾馨一的出身，我们认为不能笼统地当做一般粮店老板处理。对于这类人物必须具体分析。顾馨一的公开身份虽为粮店老板，但“当时他与日本人方面有了联络，独自经营杂粮”以致“获利颇多”。此外，他还和买办王一亭、虞洽卿等常常往来^①，并与王一亭等多次合伙经营。由此可见，顾馨一的资本积累，很可能并非一般商业积累，而应属于买办类型的。

表3 榨油工业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设立年度	工厂名称	创办人及其出身	资本额（元）
1897	上海大德榨油厂	朱志尧（东方汇理买办）	210000
1899	上海同昌榨油厂	朱志尧	130000
1905	上溢大有机器榨油厂	席裕福、朱葆三（平和洋行买办）	140000
1909	上海立德油厂	刘长荫（历任各洋行买办经理四十年）	364000

上海棉子榨油业之首创者大德榨油厂，是官僚盛宣怀指派买办朱志尧经手创办的。朱志尧，浙江奉化人，继承他父亲的职业，充当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大德由他经理，他是否亦是股东，现在尚无材料可资证明。然而根据当时工商界的一般情况推测，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资方代理人，投有资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大德而外，其余三家油厂均为买办所创设。^②不难看出，在榨油业的原始资本中，从买办财富转化而来的占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更为分明。

表4 金属加工工业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设立年度	工厂名称	创办人及其出身	资本额（元）
1902	上海求新机器厂	朱志尧（东方汇理买办）	699000
1902	上海大隆机器厂	严裕棠（买办）	100000 ^③

① 山本喜一郎：《中日实业家兴信录》，第853页，转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第958页。

② 大有榨油厂资本主之一——席裕福，其出身尚属推测，疑为汇丰银行买办席裕成（即席立功）之兄弟，据《中日实业家兴信录》日文记载，席立功兄弟三人均为洋行或银行买办。

③ 大隆机器厂的资本额，据《中华民国实业名鉴》（日文）为十万元。

这一时期，上海建有十多家机器厂。^①不过，除表4所列两家以外，其余十来家规模很小，资本额多数都在一万元以下，有的甚至还是手工工场。旧中国机械工业的微弱和狭小，从它的诞生时期就表现出来。

朱志尧的出身，上面已屡次提到，不再重述。关于大隆机器厂的创办人——严裕棠的出身，则尚待考证，有说是铁匠^②，但据《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一书^③作者的调查，严的父亲曾任洋行包工头和买办。严裕棠本人也一度在洋行当差。显然，严的家庭成分及本人出身皆属买办阶级，可无疑。因而大隆的垫支资本显然也是和买办资本分不开的。将严裕棠的出身说成是铁匠，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

此外，如火柴业也是后来中国民族资本投放较多的一个部门。上海最早的一家大火柴厂——燮昌火柴厂，资本额20万元，创办于1890年。其资本主乃是被当时人称作火柴业鼻祖的叶澄衷。关于叶的出身，有说是学徒^④，有说是商人^⑤。其实，叶澄衷由一个油房学徒一跃而成为上海的亿万富翁的事例，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买办商人暴发史的典型刻画。^⑥

上海民族资本投资的几个主要行业中，关于缫丝业，我们知道的更少，似乎也比较特殊。这一时期，缫丝业主要集中在广东顺德一地，上海尚属比较发达。根据材料，辛亥革命前，上海一地创办的较大规模的机器缫丝厂近30家，然而其中一半工厂的创办年代不明，绝大多数工厂的创办人及其出身也尚未查清。已知创办人出身的仅四家，其中商人一人（即1881年黄佐卿创办公和永缫丝厂）；官僚一人（即1900年薛南溟创办永泰裕缫丝厂）；买办二人（即1893年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创办瑞纶丝厂，1904年怡和买办祝大椿创办源昌缫丝厂）。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海、南通、无锡三个地区的棉纺织、面粉、榨油、金属加工、火柴以及缫丝等六个主要行业中，民族资本创办的较大规模的企业约38家，已初步查明其出身的创办人或投资人共42人。据粗略分类，其中买办和买办商人26人，官僚10人，钱庄主和一般商人6人。很明白，买办占首要地位，官僚占次要地位，旧式钱庄主和商人亦有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第920页，附录二《历年设立的机器工厂名录》。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第20页。

③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④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50页。

⑤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954页。

⑥ 叶澄衷的发家史见本文第三节。

少部分，唯独地主，则一个也没有。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原始资本来源中，就绝对没有包括地租的转化。但必须承认，上海最早创办的这一批较大规模的企业中，确实很少属地主投资的，更谈不上——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占首要地位。

持有“地租转化占首要地位”这一论点的人，其根据也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他们举聂缉椟家族为例，说聂缉椟、聂云台父子购买华兴纺织新局股票，租办华兴，以致最后收买复泰的资金，都是种福垸的地租剥削的转化。^①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 1890 年起，聂缉椟连任上海道台五年，1894 年交卸沪道时，发现“亏空”90 万两。这笔钱到哪里去了？这些大官僚当然讳言这是他们贪污中饱所致，然而事实真相却是昭然若揭：一面是所谓的“亏空”，另一面则是聂家私人财产的膨胀。请看下面几笔账：（1）1891 年购买华兴股票，1904 年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华兴，1905 年收买复泰，独资经营，易名恒丰纱厂；（2）聂交卸沪道时，其妻曾纪芬存折上有 8000 余两存款；（3）聂任沪道后，每月给他的母亲张氏月费 300 两，张氏回湘后陆续另汇三四万两作造屋之费；（4）自 1905 年起，又在洞庭湖滨，领垦湖田 50000 亩，建立起中国式的封建大庄园——种福垸。不仅如此，甚至后来恒丰纱厂的利润也源源汇回湖南购买土地。

由此可见，与其说聂家财富积累的变换情况是地租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典型，毋宁说它是官僚资本、工业利润倒回农村进行土地投资放弃工业的实例。

不仅聂家这样，其他地主、官僚走同样道路者，举不胜举。

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剥削特别残酷。封建剥削特别残酷，而土地的购买又极其自由。所以，官僚由做官贪污所得，商人高利贷由压榨盘剥所得，往往流回农村，作为兼并土地的手段。至于地主，就更不愿意将他们的地租收入投入他们一向所不熟悉、所不习惯的工业。在他们看来，经营工业是多么麻烦，还要蒙受财产不翼而飞的风险，买进土地，坐食地租，则是安逸的事情，何况地租又是超过收获量的 70% 以上的优厚收入。

由此可见，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始垫支资本中来自地主阶级者之所以这样少，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的，并不是什么反常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对地主经济来说，剧

^① 《山东大学学报》1959 年第 3 期，第 60 页。

烈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乃是支配它的法则。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①

至于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创办人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买办，看一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的状况，就不难理解了。

三

买办制度是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的产物。日本、印度和南洋各国都存在过这种制度。在中国，买办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开始形成的一个特殊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于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的人民大众。”^②

当资本主义列强处在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利用多次发动侵略战争所攫取的特权，倾销商品和搜括原料，并非法地设立银行和经营航运业、加工工业。

19世纪最后30年，当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强烈的对外侵略就日益注重资本输出。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和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正是适应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从此以后，中国除了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市场以外，又成了国际资本的投资场所。

当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方式，还限于推销工业制造品、搜括农产原料时，他们如果不借助于买办，是完全无力进行掠夺的。当外国资本在中国设银行、开矿山、行轮船、办工厂，进行更直接的掠夺时，同样也少不了买办。据海关册记载：1890~1913年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约由两亿一千多万关两增至九亿七千多万关两，而同时期，中国一切通商口岸的全部外籍商行数最高还不足四千家，各种外籍人员总数不过十六万多人。这么几家外籍商行完全不可能和中国人民进行直接交易到如此庞大的数字。所以洋货在既到通商口岸之后，土货在未到通商口岸之前，自两亿一千多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6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599页。

至九亿七千多万两的贸易额全部必须经过买办之手。

买办，这个名称，鸦片战争前虽已存在，但它和近代意义上的买办，是迥然不同的。鸦片战争前，他们是清政府管理来华外商的人员。他们和外国资本的关系，和后来刚好相反，是控制外商，而不是为外商所控制。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无论其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从此外国商人可以自由选择买办，控制买办，买办也就成为外国资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买办以抽取经纪费用为利润，是永远只会赢利不会破产的。经过几十年的生长，买办显然已成为一个人数众多而又财力雄厚的显赫阶级了。

这个阶级的存在，是人人都会观察到的；这个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之雄厚，也是众所公认的。当时人这样说：“沪埠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①“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②丝茶是当时中国出口贸易中两宗主要的商品，像在福州、南台经营丝茶的“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咸以来，操其术者，皆起家巨万”^③。但是，由于他们隐蔽身份，耻言买办，讳言他们的生财之道，所以人们很难捉摸其势力，涉及买办的若干统计和记载，也不免是挂一漏万极不完全的。

关于买办的收入，严中平同志根据海关册，曾作过如下估计：“1890～1913年，对外贸易总值共计12491969000关两，从低估计经纪费用，以5%计算，二十四年里，全国买办阶级共获利润达六亿二千多万关两之多。”^④实际上，这个数字远不是买办阶级所得财富的全部。第一，这个数字仅仅包括24年，而买办制度，从其产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第二，这个贸易总值，是指通过海关的所谓合法贸易而言，大批走私并没有计算在内，也无从计算；第三，那些在中国境内，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就地制造就地销售的直接投资，也没有包括进去。如果估计到上述因素，那么买办的积累定是比六亿二千多万要大得多的一个数字。

因此，当中国开始发展大机器工业时，买办投资的大量出现，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企业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

① 王韬：《瀛壖杂志》卷1，第8页。

② 《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第27页。

③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第155页。

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以及同洋人外国的种种固有联系。这正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金也是无从购买的。因此，当地主、官僚、高利贷者都同样握有巨额货币财富，甚至像地主显然比买办积累更多的情况下，首先投资于近代机器工业，并在投资中占着显著优势的，是买办阶级而不是地主或其他阶级。

正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办工业必须和洋人洋货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买办无疑也就身价百倍。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表现在，买办阶级本身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优先将财富转化为资本。这可以由买办投资规模之庞大中得到证实。上面提到的那几十个企业创办人或投资人中，投资规模最大者，恰恰就是两个买办，即祝大椿和朱志尧。祝大椿是怡和洋行和上海电气电车公司的买办，创办和投资的企业有：上海源昌碾米厂、上海华兴面粉厂、上海源昌缫丝厂、上海龙章造纸厂、上海怡和源机器打包厂、苏州振兴电灯厂、无锡源康缫丝厂、上海公益纱厂、无锡惠元面粉厂、扬州振扬电灯厂^①。此外，轮船运输业、上海房地产、榨油业和中国银行，都有他的资本^②。朱志尧是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创办和投资的企业有：上海大德榨油厂、上海同昌榨油厂、上海求新机器厂，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北京溥利呢革厂、上海同昌纱厂、上海申大面粉厂、大通轮船公司^③，以及中西书屋等企业^④。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买办又成为办厂各色人物所共同依靠的势力。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者，首推棉纺织工业。它的最早的一个大型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设立过程，可以作为上述看法的一个实例。

上海机器织布局最先是由一个姓彭名汝崇^⑤的候补道于1878年呈请开设的。1878年10月5日，彭汝崇给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楨上过一稟帖^⑥，请求李、沈两人准他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其后不久，彭又特别到天津去面谒李鸿章，并再上稟帖，说明设厂计划。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第1091页。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第154页。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1091页。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第154页。

⑤ 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7工艺篇，附录，《北洋通商大臣李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札文》。

⑥ 因彭道筹设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稟帖载于1879年2月21日《北华捷报》，第168~179页，译文转见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第98~100页。